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董强 史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今年1月,贵州省两会胜利召开,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置于重要位置,这既是对多民族聚居省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觉践行。

贵州浸润着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应有之义。

以文化认同筑根基,厚植贵州民族团结沃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心灵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凝聚,而文化认同正是这一凝聚过程的核心密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深刻揭示了文化在塑造集体身份、凝聚社会共识中的根本性作用。

文化认同的根基,深植于多元一体的文明传承。这种认同不仅是情感上的归属,更是理智上的自觉,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提供了“我们是谁”的根本性回答。

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贵州的多彩文化,正是这一格局的鲜活缩影:在苗绣的经纬里,交织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侗族大歌的和声中,回荡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安顺地戏、屯堡文化中,铭刻着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轨迹。这些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保持着独特风貌,又传承

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各族群众提供了共享的精神资源,让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认知有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也为贵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筑牢了精神根基。

文化认同的培育,生长于日常交融的实践土壤。文化认同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共同参与中自然生成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历史上,贵州各民族在互动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进入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持续深化。

从“村BA”“村超”赛场上各族群众不分彼此的欢呼呐喊,到民族节庆中共同参与的民俗展演,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从校园民族文化交融课程,到社区中邻里的守望相助,中华文化成为凝聚情感的桥梁。在这些具体可感的实践中,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耕贵州民族团结的沃土。

以传承创新拓路径,打造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贵州样板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文化的传承创新则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动力。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只有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才能不断丰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活力。贵州立足省情实际,以系统思维推进文化建设,部署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让多彩文化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着力打造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贵州样板。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延续,失去传承的文化便会失去灵魂。贵州始终把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既守护有形的文化载体,对古村落、古建筑、历史遗存进行系统性保护,留住文化的物理空间;更注重传承无形的文化基因,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开设非遗进校园课程、举办传统技艺展演等方式,让银饰锻造、蜡染技艺、民间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这种保护是动态的守护,让各族群众在传承中感受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进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归属感。

文化创新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时代在发展,文化需与时俱进。贵州坚持在传承基础上创新,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通过“文化+科技”,用数字化手段记录非遗技艺、还原历史场景,让文化传播更具时代感;通过“文化+产业”,将民族元素融入文创产品、旅游体验、特色餐饮,让刺绣、酸汤等文化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经济载体;通过“文化+传媒”,打造民族文化产业IP,让贵州故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讲述贵州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名片。这些创新以现代方式激活传统文脉,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适应时代、服务群众中焕发新的生机,也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更具吸引力和凝聚力。

以文化赋能显担当,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贵州答卷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既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更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贵州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为引领,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彰显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保障。贵州的实践证明,民族文化是实现“换道超车”的“金钥匙”。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而贵州的比较优势之一正是多彩民族

文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酸汤产业,以民族饮食文化为内核,打造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千亿级产业的重要支撑;毕节市的民族刺绣产业,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村”系列的文化活动,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更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既让各族群众在发展中受益,增强了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赋能共同富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贵州将文化赋能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文化产业带动就业增收,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例如,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认定500余家非遗工坊,带动4万余人就业,实现产值26亿元,让古老的“指尖技艺”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这正是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鲜活案例,通过文化帮扶,助力经济欠发达地区深挖文化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实现“文化兴村”。在文化赋能下,共同富裕既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充盈,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凝聚共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从文化认同的根基筑牢,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建共享,再到文化赋能的实践落地,贵州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彰显了深刻的理论逻辑与鲜明的实践特色,2026年贵州省两会的战略部署,为这一探索指明了更清晰的路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贵州必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发展与团结同步,让多彩的特色文化之花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加磅礴的精神力量。

【作者分别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把握对口支援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

□ 洪玺铭 陈兴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口支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各民族携手并进、共同迈向现代化进程、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机制之一。这一政策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性帮扶模式,而是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制度设计,以及长期不懈、广泛深入的社会互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坚实的桥梁,促进彼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实现更加紧密的互动与合作,进而从物质、文化和精神等多个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深化对口支援产生的“互嵌式”发展格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深化对口支援的“互嵌式”发展格局,关键在于超越传统单向度资金与项目援助,通过制度化顶层设计持续政策协同,在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构建产业关联、市场互通、人才互动、利益共享的深度联结网络。此格局是把东部现代经济要素与西部后

发优势有机融合、系统整合,目标是形成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比如,在产业规划、园区建设上共同谋划投资,产业链互为上下游,连接各地区发展前景,这既缓解了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共同物质基础。当来自不同地域的各族群众在同一产业链上分工协作,为同一产品进入市场共同努力,并共享由此带来的发展红利时,集体身份认同,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自觉体认,便在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中得到持续滋养和强化。

以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其协作超越初期项目共建,形成深度“互嵌”典范。双方共建的“浙江产业园”(如阿克苏纺织工业城),不仅是企业集聚平台,更是制度、技术与文化交融平台。浙江引入龙头企业,配套带来供应链、技术标准和产业渠道,还通过“小组团”人才援疆、干部挂职、技能培训等形式,为该地培养大批本土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这种紧密协作使先进技术、管理理念与本土经验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增进理解、建立信任、形成默契。经济增长同步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具象化。无数“互嵌”场景使跨越地域的经济合作升华为利益纽带、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强化对口支援的文化浸润功能,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对口支援的文化浸润功能,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而有温度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而在思想情感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致力于各族群众尤其是

年轻一代,搭建稳定、常态化的交往平台,让他们在共同学习、共同体验、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拉近心灵的距离。例如,浙江省湖州市援疆指挥部通过开展“石榴籽”青少年融情夏令营等活动,让浙江与新疆柯坪的孩子们在研学中共同感受湖笔、丝绸等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基于共同文化体验的互动,促进了孩子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文化共鸣。

在实践中,这一路径通过系统化的机制设计得以深化。一方面,其着力于构建多层次、常态化的交流网络,覆盖教育、文艺、体育、民生等多个领域。例如,浙江省杭州市通过推动中小学校结对全覆盖、组织“最美家庭走亲访友”、举办杭阿马拉松等活动,为阿克苏市与杭州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提供稳定多样的互动场景。另一方面,其注重激发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合力。无论是福建南平将朱子文化、茶文化引入新疆木垒,通过茶艺培训、经典诵读等活动以文润心,还是浙江瓯海与四川阿坝通过青灯市集共享非遗项目,推动“文化走亲”,都体现了对口支援从重视项目援助,逐步转变为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与情感共鸣。

弘扬“对口支援精神”,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资源。凝练与弘扬“对口支援精神”,即将对口支援实践中展现出的崇高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行系统总结与升华,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话语资源,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通过对口支援,各地区、各民族凝结成了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为回答“我们

为何是一个共同体”及“我们如何共同走向未来”提供了鲜活、可信的叙事基础。将这种源于实践的精神提炼为“援藏精神”“援疆精神”等具象化符号,能够极大地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使其从理论阐述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

具体实践表明,对口支援精神的弘扬亦可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凝聚力。例如,在长达三十年的援藏工作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践行着“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信念,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在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重大项目上,也贯穿于日常交往中,如援藏医生与当地医护携手抢救生命、援藏教师为高原孩子点亮求梦梦想,这些事迹通过媒体报道、报告文学、影视作品等方式传播,构成了感人至深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通过系统梳理和广泛宣传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能够使“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在精神层面更加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分别系安徽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特聘副教授、博士后;安徽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5年度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对口支援赋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研究》(ZLYJ202506)、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电视剧《乌蒙深处》的镜头掠过乌蒙群山的层峦叠嶂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山乡脉动,更是一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代生活中扎根的深度实践。《乌蒙深处》以影像创作的形式,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可认同的文化实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维度上,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影视案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链接

传统非遗的影像表达常陷入仪式化展演的惯性,将镜头聚焦于重大节庆舞台的程式化动作,解说词强调原汁原味的历史渊源,表演者如同被抽离日常的文化符号。《乌蒙深处》则通过生活化叙事方式,使之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媒介与认同资源,让非遗回归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

生活流叙事的剧作创作方式改变了非遗在叙事中存在的性质与功能。剧中“村秀”舞台上,年逾古稀的传承人吴恩芸压轴登场,这位将一生浸透于苗绣与民族歌曲的老人开口吟唱《蝴蝶妈妈》时,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合唱与共鸣。吴恩芸在“村秀”舞台的吟唱,让在场的各族观众都在此刻融入了一个由共同情感与文化遗产所维系的共同体之中。

《乌蒙深处》中生活流叙事的核心在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与生活日常进行深度融合,证明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活跃于当下、促进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活态文化实践。当山歌成为抒发个人成绩的媒介,当苗绣图案融入现代产业并带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非遗便自然而然地叙说着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相亲近的故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性转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乌蒙深处》揭示了非遗的当代存续不仅需要活态展演,更需融入区域发展,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的功能性纽带,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支撑。

剧中的悬崖村苗绣厂由绣娘麻秀梅创立,带领村里的绣娘们形成一个新的生产集体与社会单元。她们不再是分散于各家各户的传承者,而是被整合进现代的经济组织中。这种因共同经济活动和文化资源而建立的新型社会联结,极大地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并重塑了民族文化认同与社会协作的价值意蕴。同时,苗绣产品通过电商、文旅等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一过程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的格局。非遗产业成为连接民族地区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桥梁,使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进程,夯实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的认知基础。

剧中女主角袁月亮走进校园教授苗绣的情节,生动展现了非遗从技艺传承向教育功能创造性转化。袁月亮通过教孩子们绣制简单纹样,激发孩子们学习苗绣的兴趣,让非遗传承扎根少年心中。这种教育实践,培育了其对于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自觉尊重与深刻认同。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单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使年轻一代在切身实践中体会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坚实且持久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叙事与国际传播

《乌蒙深处》对非遗传承的表达,本质是一场影像转译的实践——通过电视剧的视听语言与叙事逻辑,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表达与成功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内部的情感与文化认同,延伸至外部世界的认同与尊重之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形象与生命力。

《乌蒙深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是站在全球化的视觉场域中,强调我国非遗在与世界对话并重塑自身主体性的能力。剧中以袁月亮带着绣娘们最终站上了巴黎走秀的舞台为叙事高潮,使该剧从地方性知识转向全球共享经验。绣娘们对苗绣纹样进行当代审美简化时,仍坚守“双针绕线绣”“打籽绣”等传统核心技艺,体现了她们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性是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主动将中华民族美学精髓转化为世界通行的设计语言。

《乌蒙深处》所描绘的非遗国际化,是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之中,使其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活力,成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坚固文化基石。当全球观众为精美的苗绣作品赞叹时,不仅是中华文化之美,更是一个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民族区域发展的生动案例。这个案例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逻辑,并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从外部视角反向巩固了内部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与信心。

《乌蒙深处》通过影像叙事,生动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植根于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文化实践之中。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他者”的风景,而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当“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实践汇聚为“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力量,更让观众深刻理解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深层意蕴。《乌蒙深处》提供了一个非遗影像如何参与民族文化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案例。在进行民族题材影视创作时,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影像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这要求创作者既要深入理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深层含义,又要具备当代意识与全球对话能力,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共鸣的共享经验。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贵州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背景下国际传播创新策略研究》(编号:24GZQN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以非遗叙事创新为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基于电视剧《乌蒙深处》分析

□ 骆宇 娄立原